



中共党史資料專題研究集

抗日战争时期（二）

中共中央党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征集研究室編

中共党史資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

抗日战争时期（二）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征 集 研 究 室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年·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

抗日战争时期(二)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昌平区东沙屯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7.5印张 195千字

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2300册

ISBN 7-80023-075-9/K·122

定价：3.65 元

前 言

为了促进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学习和研究，向教学、科研和其他有关方面提供准确的党史资料，同时也反映和交流全国各地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成果，推动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我们将陆续选编若干本《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

1983年1月，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天津召开第二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确定了“在普遍发动、广泛征集的基础上转为重点征集和专题研究，扎扎实实地把急需的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的工作方针，通过了《1983至1985年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规划》，拟订了一批专题征集研究项目。《规划》要求，上报中央征委会的专题资料，包括三个部分：（1）资料综述，即专题调查报告；（2）有关专题的主要资料和资料目录；（3）关于专题资料搜集、整理、审核情况的工作报告。这次会议以后，各地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部门在党委领导下，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查访问、实地考察、查阅文献、订正史实，搜集到不少珍贵资料，弄清了一些长期不清楚的问题，产生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史料研究成果。《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就是这些成果的结晶。

选入本书的专题，各地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部门都曾反复征求过史事亲历者和专家的意见。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又对史实作了校正，对文字作了推敲。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错讹和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特别是亲历史事的老同志予以指正。

本集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专集。八路军办事处是我们党内、军内以及当时社会上通用的名称，对外，公开挂

的牌子先后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或“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陆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某地办事处。本集采编了西安等13个主要办事处的专题。

编 者

1987年11月

目 录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1)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	
.....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23)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纪念馆 (45)
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	
.....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61)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专题编写组 (73)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	中共兰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92)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	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史办公室 (106)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	
.....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长沙市文化局 (123)
八路军驻粤办事处	
.....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41)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	中共广东省委“八办”党史处 (156)
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	中共洛阳市委党史办公室 (185)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中共桂林市委党史办公室 (200)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中共南方局党史研究室红岩革命纪念馆 (215)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一、“西办”的建立及其组织沿革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通电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后，随即于西安七贤庄一号门外挂起了“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这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处。

早在1936年春末，七贤庄10套院落成之初，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就用200块银元作押金，租下了一号院，设立了党的秘密联络转运站。在西安事变前的半年多时间里，这个秘密联络转运站，除了出色地完成向陕北苏区运送药品、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等紧缺物品外，还安装了一个小电台和一部扩大机，把党中央设在保安的“红色中华社”的广播，转播到全国各地去。西安事变发生后，为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我党代表团到达西安。代表团的叶剑英、左权等就住在七贤庄一号。“二·二”^①事件发生后，西安形势一度紧张，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罗瑞卿等亦由张学良公馆迁到七贤庄一号。

^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并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在对入陕中央军的“战”与“和”问题上，东北军内部发生意见分歧。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主和的元老派王以哲军长。史称“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在西安的活动基本上合法化，七贤庄一号院便成为“红军联络处”，又称“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协调发展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的联络团结工作；开展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工作；采办陕北苏区和红军部队所急需的粮秣、服装、武器等物品。由于这时我党还未与国民党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因此，一号院大门外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三十八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的牌子，其工作由叶剑英总负责，李克农、张文彬、李涛先后担任过秘书长。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底，红军联络处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与充实，由林伯渠、宣侠父、叶季壮、伍云甫等分头主持各项工作，为开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做准备。

1937年8月25日，红军联络处的同志们及时将自己油印的朱德、彭德怀就职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通电，向西安各界人士及各机关团体散发。通电引起极大的反响。西安的爱国知名人士、政界要人、军界将领、省府主席和抗战团体纷纷致电致函，表示热烈祝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实际建立。七贤庄一号门口挂起“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正式成立。1937年9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各战区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于是七贤庄一号门口改换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仿宋体蓝底白字的长条木牌，直至1946年撤退。由于八路军东渡黄河后在平型关、娘子关、阳明堡等地打击日寇，连战告捷，闻名遐迩，所以人们在口头上依旧把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称作八路军办事处。为了和相继设立在南京、兰州、武汉、太原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相区别，又简称“西办”，很多人又叫它“七贤庄”。

随着抗日战争的需要，“西办”的任务越来越繁重。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由全国各地汇聚来这里要求到延安去；一些地方政府、友军部队要求派干部去帮助他们刷新政治和整顿地方部

队；西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团体邀请去人演讲、宣传、讲课和帮助搞训练；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被俘和失散的人员等待营救和收编；还要为延安和前线采办运输军需和生产、生活用品，等等。工作范围不断扩大，人员也由初期的几十人增加到后来的200多人。

1938年春，“西办”又租用了七贤庄七号院，我党我军各学校训练班的招生委员会设在这里，还在七号院、革命公园、通济南坊27号等处设立了招待所。1939年初，又租用了三号院，把交通发行科、统一战线科迁到此院办公。“西办”还在西安火车站附近的自强东路中段13号，以及虢镇、长武等三处设有仓库。汽车库设在尚德路15号。在北大街通济坊375号设立了《解放》周刊、《新华日报》分销处。在西郊范家村、西辛庄设立了防空袭疏散住宿处。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分工情况（系1938年6月时的情况）如下表：

处长	总务科长	副官 (3)	交际、采办、保管
		警卫班 (11)	
		勤务班 (5)	汽车司机 (1)
		医务室 (2)	收发室 (2)
		炊事员 (4)	
	招待所: 主任 (1) 副官 (2) 勤务 (4) 伙伙 (4)		
	秘书科长 (1)	秘书 (2)	书记 (4)
	机要科长 (1)	译电室组长 (1)	译电员 (2)
		电台台长 (1)	报务员 (2)
	统战科科长 (1)	科员 (4)	
	交通发行科科长 (1)	科员 (4)	
	会计科科长 (1)	科员会计、出纳 (2)	
	经理科科长 (1) 兼兵站工作	会计 (1)	
		采办股股长 (1)	
		粮务股股长 (1)	
		运输股股长 (1)	一汽车队
		兵站股股长 (1)	
		押车排 (1)	副官 (10)
		管理员 (1)	勤务 (6) 炊事员 (4)
		警卫排 (1)	第一班 第二班 (19) 第三班
		火车站 (3)	警二班警戒
		仓库: 虢镇 (3)	警三班警戒
		长武 (7)	385旅一连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负责人员有:

中共中央驻陕党代表: 林伯渠 (1937年5月—1940年)、
董必武 (1940年—1941年1月)

八路军总部驻西安的高级参议: 宣侠父 (1937年2月—
1938年7月31日)

“西办”处长: 李涛 (1937年5月—8月)

伍云甫 (1937年8月—1942年年初)

周子健（1942年—1946年9月）

副处长：李 华（1939年年初—1941年）

采办委员会负责人：叶季壮（1937年年初—1938年）

“西办”各科负责人（依任职先后顺序排列，时间不注）：

总务科科长：莫钧涛、史唯然

副科长：赵孟明、苏刚达

秘书科长：年达人、周子健

会计科科长：曹根全、王少川

机要科科长：童小鹏、李金德、孔石泉、吴振英、赖奎、李唐彬、薛丹浩

电台台长：曾 三、林 青、黄 滨、林英才、刘泮林

统战科科长：李初梨、居 敬

交通发行科科长：刘 维

副科长：徐光庭、宋之远

经理科科长：张元培、吴习智、汤 池、喻 杰

二、“西办”的主要活动

“西办”从它的前身——“联络转运站”、“红军联络处”起直到1946年9月撤退，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各项指示，完成了各项任务，现将其担负的主要任务和主要活动分述如下：

（一）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西安是抗日的大后方，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地，又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重要通道。最大限度地动员西安各阶层人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西办”面临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人民群众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军。“西办”把统战工作的

重点放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方面。“西办”曾协助中共陕西省委开展西安群众救亡运动。抗战开始的一两年中，西安地区就建立了20多个救亡团体。为了宣传和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抗日，“西办”工作人员经常挤时间到社会上去，向各界群众进行演讲、讲课、演出等宣传工作。林伯渠曾应邀在省立二中和扶轮社讲课，伍云甫在铭贤中学做《敌我对比的转变与青年的任务》的报告，陈耳东在省立二中、竞存中学讲“游击战术”，居敬在西安高中讲“十证法”。西安民先队举办骨干训练班，请宣侠父去讲“怎样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还请过往留住“西办”的彭德怀和赖传珠去讲“怎样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游击战术”等课。这些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在八路军东渡黄河连战告捷，军威大震的情况下，西安许多学校、团体竞相邀请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去讲演。“西办”对此有求必应。“西办”还组织了宣传队，参加由省抗敌后援会举办的“雪耻宣传周”、“总理纪念周”、“七·七”两周年等宣传活动，在街头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送郎上前线》、《汉奸作寿》等宣传抗日的节目。“西办”还组织全体人员上街游行，宣讲抗日前线的战况，增强广大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1937年11月，西安同仁医院副院长罗锦文串连一些医护人员，组成了“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西办”积极支持和帮助他们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全国第一个志愿上前线的救护队。“西办”还动员组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工厂，宣传抗日救亡，搞募捐，并把群众捐献的寒衣等物转运到前线去。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给西安各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重要时刻，爱国志士及各团体十分渴望聆听他对时局的意见。1937年11月，周恩来由山西返回延安，途经西安在办事处留住一天，“西办”全体人员一齐动手，印发请柬，布置会场，周恩来给西安各界300多人做了《五个月抗战的总结》的报告。1938年3月，周恩来在省立二中就抗日问

题给学生们做了一次振奋人心的报告，当时操场上挤满了人，连墙头、树杈上都坐着不少听报告的人，在周恩来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话中，会场是那样的肃静，又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其盛况在西安是前所未有的。许多当年在场的同志至今仍记忆犹新。此外，周恩来在西安还做过《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演讲。这些都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西办”还接待和安排全国各地来西安进行的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活动。1938年3月初，著名女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山西前线来到西安进行演出。为争取他们在西安活动的合法地位，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利用他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有师生、学友的特殊关系，陪同丁玲会见这些达官要人。“西战团”33名团员齐心协力，演出了许多宣传抗日的节目，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参加了座谈会、纪念会，声势浩大，轰动了古城西安。蒋鼎文给“西战团”捐款200元，胡宗南邀请丁玲、宣侠父赴宴。“西战团”在西安站住了脚跟，坚持演出达4个月之久。抗战初期，宋之的率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樊镜秋率领的“难民孩子剧团”、汪达之率领的“新安旅行团”等抗日救亡宣传团体，在来西安演出过程中，都得到过“西办”的支持与帮助。

千方百计发行我党的书刊，是“西办”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1937年10月26日，“西办”在北大街通济坊375号开设了《解放》周刊分销处，还承担了销售武汉、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任务。《解放》和《新华日报》在西安极受欢迎，群众踊跃购买，互相传阅，时常出现夜半叩门和拂晓等在门口买报的动人情景。为了满足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西办”除将两报刊张贴在来往行人多的闹市区外，还在七贤庄一号院临街的窗口设立销售处，在平民坊、马坊门、土地庙十字的书店设立代售点，同时还通过邮局的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并与进步的报社、书店建立

联系，向外地、外县发售书报刊物。西安秦风报社就承担过《新华日报》的增印、发行工作。1938年，苏联经新疆给我党运来近万本中、俄文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批书运到西安后，中央指示将一部分送往延安，一部分分发给华北局、南方局，各省委，最后剩余的在西安几个书店销售。

林伯渠、宣侠父、伍云甫等同志，在“西办”期间，非常注意在知名人士中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们与各抗日团体的负责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杨明轩、杜斌丞、张性初、车向忱、马得涵、刘古风、郑伯奇、曹靖华、于振瀛、陈建晨、侯外庐、张知道、宋联奎、李敷仁等保持经常的联系。这些知名人士很钦仰周恩来、朱德总司令，“西办”就满足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安排了会见。他们中许多人是中国共产党可信赖的朋友和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如东北军子女学校——竞存学校校长车向忱就是这样，他积极任用进步青年及共产党员担任教师，扣人心弦的救亡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就是该校的教师；他还邀请“西办”的陈耳东等人给学生讲游击战争战术，并组织学生到郊外进行演习，进行战地救护训练。车向忱还亲自向“西办”介绍进步学生去延安参加革命。东北军调离陕西后，他办的学校经费发生了困难，“西办”从统战经费中每月抽出200元支援办学，使学校度过了难关。还有被毛泽东誉为“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的杜斌丞，他竭力支持并帮助“西办”开展统战工作，利用自己在省府身居要职的条件，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工作。陈建晨主编的《大团结》刊载过林伯渠、宣侠父的讲话，向国民党管辖区各界介绍抗大、陕北公学的情况，他还开办纺织厂，招收抗日军人家属进厂做工，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积极的贡献。

党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通过“西办”这个据点去进行国民党当局西安军政部门上层领导人的工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途经西安时，经常致力于与上层人士的频繁接触。1940年5

月，周恩来赴重庆、朱德回延安途经西安时，他们两人在西安的活动就说明了这一点：

16日，上午，周恩来赴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处聚餐。下午，周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宴。

17日，上午，周恩来由伍云甫陪同游宋家花园，林卓午（邮政总局军邮总视察）、西密斯（驻陕军邮局局长）盛情款待周，彼此交谈颇欢洽。晚上，朱德总司令偕夫人康克清及随行人员由洛阳乘火车抵西安。

18日，下午，省政府蒋（鼎文）主席宴请朱德、周恩来。

19日，上午，西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温起凡、杨明轩、刘古风、芦竞群先后来访朱德、周恩来。下午，朱、周赴芦佐（军政部江北兵站总监部副部长）处宴。6时后，又赴胡宗南处宴。

20日，中午，朱德、周恩来赴谷正鼎处宴。

21日，下午，周恩来等一行起程赴渝。朱总应胡宗南邀请赴宴。

22日，上午，朱总由伍处长陪同，赴谷正鼎处谈话，在座的有郭紫峻、周心茗。下午4时后，又去会见芦佐部长与温起凡。

23日，上午，朱总一行准备赴延，因天雨未行。下午1时半，朱总由伍处长陪同会见蒋（鼎文）主席。

24日，朱总一行乘汽车5辆开往延安。

从以上活动日程，可以看出我党领导同志对上层统战工作的重视和为此而做的努力。

林伯渠也很重视上层统战工作，他和一些上层人士交朋友，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使得这些上层人士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韩安是西安林务局局长，曾做过我党一位同志的老师，是一个颇有爱国心的高级官员。林老与他结识后，常常带给他《军

政杂志》等报刊，并给他介绍我党的抗战主张。韩安则请林老给他的同僚部属讲三民主义、太平天国革命等，彼此交往甚笃。当时，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与林务局所属的革命公园毗邻。公园管理不好，荒凉破败，残垣断壁，游人甚少，特务便探随意出入，园内经常出事。林老向韩安推荐了抗大毕业生林明到园里搞管理。林明得到韩安的支持，团结园内工人，修墙铺路，养花种草，加强管理，吸引游客。这样，公园面貌大大改观，特务流氓的破坏不得不有所收敛。1938年5月，林老还给韩安介绍了李华明、杜荫森等10多个抗大毕业生到南山公园干事。这些由延安来的干部把公园的救亡活动搞得很活跃，并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

林卓午是中华邮政总局少将军邮总视察，负责晋、陕等省的军邮工作，在西安设有办事处。他到西安后，积极与我党密切联系，力合通作，致力于开辟战区的邮路，与林老结成了亲密的朋友。为了躲避监视，林卓午请同僚和林老去湖南饭馆赴宴，宣称他与林老联宗。从此，他更加努力地沟通边区与国民党管辖区的邮路，便利人民通信而工作。从1938年4月起，由西安至延安的邮件由“西办”汽车队带运，延安南下邮件由延安汽车队带运。他还切实整顿了三原至绥德的邮路，改变了原来国共两区通邮的瘫痪状态。为了表明我党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诚意，以及激励林卓午的爱国热忱，1940年5月，周恩来在西安南郊宋家花园给驻陕军邮局四五十名职工讲了话，并给林卓午赠送了“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题词。1942年，林卓午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亲切会见。

国民党军政部驻陕军需局局长汪维恒早年参加过共产党，林伯渠因为公务与他交往较多，多次交谈。周恩来在重庆也与汪两次谈话，复苏他的革命之心。汪在驻陕军需局任职期间，不仅在军需物资方面不刁难我军，而且还多次设法营救被扣的我工作人员和爱国青年。